

中等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之影響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尚憶薇*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古志銘

摘 要

目的：本研究以目標取向理論觀點探討中等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之研究。**方法：**以中等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作為研究工具，採便利取樣方式進行調查，共計發放 3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09 份，有效回收率 69.6%。**結果：**中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傾向工作取向對於教練—選手關係的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此外，射箭學生運動員傾向自我取向則與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呈現負向關係。**結論：**中等學校學生運動員傾向工作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中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具有高度相關性。中等學校運動教練應多鼓勵學生運動員精熟技能，作為評斷成功的標準，同時也能夠提升正向教練—選手間良好關係。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透過質性研究方式進行，深入瞭解不同目標取向學生運動員對於教練—選手關係之相互依賴的程度，改善團隊凝聚力與運動成績表現，進一步提供運動教練將建立運動夥伴關係，且對學生運動員的發展帶來積極影響。

關鍵詞：工作取向、自我取向、人際關係、運動表現

壹、緒論

目標取向是指個人能力的建構與成敗主觀認知，進而瞭解投入工作原因，以促進個人的學習動機及其行為 (Wolters, 2004)。目標取向分為「工作取向」與「自我取向」，「工作取向」是強調個人的技巧精熟與學習進步；而「自我取向」強調競爭與比賽，將擊敗對手視為成功 (陳淑滿、王俊明, 2005)。在運動的情境中，不同取向學生運動員會影響決定成功與否的相關行為，包括努力程度、工作選擇、持續參與、運動表現等，因此運動教練須瞭解學生運動員的目標取向並依據不同目標取向給予建議或期望 (Nicholls, 1989)。運動領域對目標取向進行探討的實證性研究甚為豐富，大部份研究結果發現目標取向對於個人學習動機與運動表現有決定性的影響 (Hom, Duda, & Miller, 1993; Williams, 1994)，例如 Williams (1994) 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呈現較高的自我取向運動選手對運動結果以及重要他人評價比較重視，而呈現較高的工作取向運動選手則傾向於自我學習、努力提升自我能力。Hom 等 (1993) 的研究結果發現，年輕運動選手傾向高工作取向和高自我取向認為自己具有較佳的能力和好的表現，且較滿意自己的運動表現。換言之，目標取向與環境情境因素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與運動表現。

教練是運動團隊中的重要的關鍵

者，除了負責運動技能訓練和比賽策略應用，也影響選手是否願意付出努力的程度以及參與動機，此表示教練—選手關係會影響到心理與結果表現 (季力康、陳思羽、葉允棋、江衍宏, 2013)，因此，教練和選手關係之探討為動態過程 (Jowett, 2005; Jowett & Ntoumanis, 2004)。在運動團隊中，教練和選手關係為一種獨特的人際關係，兩者之間的情感，思想和行為處於相互關連性，互相依賴的情況，有助於提升運動員的成績表現 (Adie & Jowett, 2010; Jowett & Meek, 2000; Jowett, 2017)。Jowett 與 Ntoumanis (2004) 建構出教練—選手關係量表，分為三個構面，(一) 親近性 (closeness)：教練和選手間，在情緒上彼此感受到親密的感覺；(二) 承諾性 (commitment)：教練和選手意圖維持與加強他們之間的關係；(三) 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教練和選手在訓練中相互合作的行為，為了達成共同的目標。相關研究成果顯示，依照教練和選手關係模式概念，兩者間的關係可以滿足學生運動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會使學生運動員在團隊中表現滿意，進而產生正面的學習成果 (Hinde, 1997; Jowett & Lavallec, 2007; Olympiou, Jowett, & Duda, 2008)。Hinde (1997) 指出，當教練和選手維持正向密切關係時，兩者間的想法越會趨於一致，運動選手對團隊感到滿

意。反之，教練和選手呈現負面關係時，運動選手則會對團隊呈現不滿意的狀況。許多研究成果以學校運動訓練情境為主，研究指出教練與學生運動員的互動關係會影響學生運動員持續參與運動訓練的決定 (Gervis & Dunn, 2004; Jowett, 2007; Jowett & Cockerill, 2003; Jowett & Ntoumanis, 2004)，上述研究結果皆獲得反應良好的結論。例如，Jowett 與 Ntoumanis (2004) 在研究中指出，當教練和選手彼此間關係正向的發展，教練可讓運動訓練更具成效，且可以提昇學生運動員持續參與運動訓練，進而增進個人與團隊的表現。Jowett 與 Lavallee (2007) 認為教練和選手間為共同依存的关系，教練和選手關係越趨正向對於學生運動員的發展具有正向影響，包括促進教練和學生運動員正向互動，增進團隊合作發展，以提高運動成績表現。Philippe 與 Seiler (2006) 研究發現，教練—選手關係對於游泳運動選手的表現呈現正向關係，游泳運動選手在教練—選手的社會關係(親密關係)，目標溝通和設定(承諾性)以及彼此角色的接受和尊重(互補性)皆有較佳的表現。

在過去的研究中，教練—選手關係已被證實與目標取向有關聯性，例如，Olympiou 等 (2008) 在研究報告中指出教練—選手關係的親密性、承諾性和互補性與工作取向有較高的關聯性，運動員傾向強調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團隊互助合作和自我改進則

與教練的關係較佳。反之，教練—選手關係與自我取向呈現較低的關聯性，運動員傾向自我取向強調自我能力展現與競爭挑戰，則與教練的互動溝通較少。Junior 等 (2019) 研究發現運動員的工作取向和自我取向能夠解釋教練—選手關係，良好教練—選手關係對於傾向工作取向的運動員能夠協助他們專注並且致力於發展自我技能，同時提高運動表現以及學習新的策略和技術，進而使團隊更有效地表現 (Adie & Jowett, 2010; Olympiou et al., 2008)。自我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中的承諾性具有顯著相關，也就是說傾向自我取向的選手會相信自己與教練之間有著持久的承諾性關係，並且能夠協助團隊勝利 (Jowett, Shanmugam, & Caccoulis, 2012)。綜合上述研究，顯示出教練—選手關係與目標取向之間具有關聯性。目標取向探究學生運動員運動行為表現，而教練—選手關係是在情感 (affective)、認知 (cognitive) 和行為 (behavioral) 彼此相互依賴的情境。

教練—選手關係相關研究在國內已受到許多不同面向的研究，近期也累積了許多實證研究成果，季力康等 (2013) 編製了一份教練—選手關係量表對此概念發展已有重要的貢獻，此量表可用來測量大專運動員教練—選手關係使用的工具，獲得良好的信度與效度，但仍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間。在研究場域部分，現有研究多以大專院校運動員為主 (王清欉, 2014; 季

力康等，2013；鄭振洋、宋一夫、湯慧娟，2013），高中次之（黃義翔、聶喬齡，2012；陳金定，2009），而對於不同目標取向的運動員與教練—選手關係研究結果是否助於正面效益仍未確認。在運動項目部分，教練—選手關係在過去研究以團隊競爭類型運動為主（王清欉，2014；黃義翔、聶喬齡，2012），但少以個人性競技運動進行測量，對此項目學生運動員適應性

成果的效應尚未被檢驗。因此，教練—運動選手關係與目標取向的觀點聯繫起來，以利引導教練與學生運動員產出在合作行為上的良好互動成效。故本研究將藉由問卷調查中等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間驗證性研究，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的親密性，承諾性和互補性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此為本研究動機所在。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 108 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報名之國中、高中射箭代表隊的學校為主，共計 73 隊參賽隊伍之學生運動員為研究對象，並且於比賽後發放問卷給選手填答，共計發放 300 份問卷，採便利取樣方式進行調查，有效量表份數為 209 份，有效回收率 69.6%，男生為 149 人 (66.80%)、女生為 60 人 (33.20%)；平均年齡為 16.25 ± 1.25 歲。

二、研究工具

(一) 目標取向量表 (Goal Orientation Questionnaire)

採用季力康 (1993) 所修定的運動目標取向量表，本量表主要用來測量受試者在運動情境中工作取向和

自我取向，其中自我取向 4 題（例如：當其他人不能表現像我一樣時）與工作取向 3 題（例如：當我盡最大努力時），共 7 題，採用 Likert 五點式自陳量表計分，由填答者依實際感受勾選最適當之答案。每個子題答案分為五個尺度，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2、3、4、5 分。

(二) 教練—選手關係量表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CART-Q)

採用季力康等 (2013) 編製適合國內大專運動員使用的中文版教練—選手關係量表為施測工具，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以國內大專院校的運動代表隊員為施測對象。教練—選手關

係量表包括親密性 (例如：我覺得與教練很親近)、承諾性 (例如：我感謝教練為了增進我的表現，所做的付出)、互補性 (例如：被教練指導時，我會全力以赴) 共三個分量表，量表中的親密性有 4 題、承諾性有 4 題、互補性有 6 題，共 14 題。本問卷以 Likert 七點式自陳量表計分，依序為 1 分為非常不同意至 7 分為非常同意。

三、資料分析

回收問卷經研究者檢視後，將填答不確實或明顯連續填答同一答案的問卷予以剔除，採 SPSS18.0 for Windows 與 Amos 18.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 SPSS 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瞭解研究樣本特徵以及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峰度與偏態；以 Amos 檢驗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結構模式適配度，包括建構信度、聚合效度以及區別效度等指標。

參、結果

一、觀察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

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量表的觀察變項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後顯示 (表 1 和表 2)，目標取向的觀察變項平均數皆高於 4.00 以上，其中「當我學習的東西做起來是有趣的時候」(自我取向) ($M = 4.36$) 的平均數最高；在教練－選手關係方面，絕大部分的題項平均數皆高於 4.00 以上，其中「我感謝教練為了增進我的表現，所做的付出」(承諾性) ($M = 4.47$) 為教練－選手關

係平均數最高的題項，而「我覺得與教練很親近」(親密性) ($M=3.99$) 則是唯一平均數未達 4.00 以上的題項。

另外，在兩個量表的偏態與峰度方面 (表 1 和表 2)，觀察變項的偏態絕對值皆小於 3，峰度的絕對值都小於 10 (黃芳銘，2006)，表示本研究量表適合以結構方程式的最大概似法進行分析 (maximum likelihood)。

表 1 目標取向描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當我學習的東西做起來是有趣的時候	4.36	.69	-.87	.83
當我學會一項新的技巧，且會使我想做更多的練習時	4.35	.73	-.92	.66
當我盡最大努力的時候	4.35	.76	-1.16	1.63
當我所學的技巧能讓我真正地感到得心應手的時候	4.33	.80	-1.11	1.13
當我所學的東西使我想去做更多練習的時候	4.31	.77	-.96	.67
當我非常努力地去從事運動時	4.28	.79	-1.08	1.54

表2 教練—選手關係描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我感謝教練為了增進我的表現，所做的付出	4.47	.69	-1.22	1.09
我覺得在我的運動生涯中，被教練指導是值得的	4.41	.68	-.73	-.57
我願意付出時間及經歷跟著教練練習	4.34	.75	-1.06	1.09
我想要繼續跟著教練練習	4.34	.77	-.86	-.19
被教練指導時，我感受到教練給我的回應	4.33	.78	-1.10	1.29
被教練指導時，我的態度是容易親近的	4.18	.83	-.72	-.09
被教練指導時，我覺得是有趣的	4.16	.85	-.71	-.17
我喜歡教練	4.11	.85	-.73	.21
我關心教練	4.03	.86	-.54	-.01
我覺得與教練很親近	3.99	.89	-.53	-.37

二、目標取向量表與教練—選手關係 量表測量模式

(一) 模式適配指標

根據黃芳銘 (2006) 和陳順宇 (2007) 提出的模式適配標準，絕對適配指標的 GFI 需大於.90；RMSEA <.05 為良好適配、.05~.08 為不錯適配、.08~.10 為中度適配、>.10 為不良適配。增值適配指標的 NFI、TLI、CFI、IFI、RFI 均需高於.90 以上。而簡效適配 PNFI 需高於.50；Normed chi-square 則是介於 1.00 至 3.00 之間。

本研究目標取向量表與教練—選手關係量表由驗證式因素分析後

顯示，絕對適配指標 (GFI、RMSEA)、增值適配指標 (NFI、TLI、CFI、IFI、RFI) 與簡效式配指標 (PNFI) 皆達模式適配水準。但目標取向量表與教練—選手關係量表的 Normed chi-square 皆大於 3，未達適配標準。陳順宇 (2007) 表示如果僅簡效適配未達標準值整體模式還是可以被接受，表示該模式為非最簡單有效的模式。故本研究的測量模式與樣本資料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如表 3 所示。

表3 目標取向量表與教練—選手關係量表測量模式適配表

適配指標	測量指標	目標取向量	教練—選手關係
絕對適配指標	GFI	.97	.95
	RMSEA	.08	.09
增值適配指標	NFI	.96	.94
	TLI	.95	.94
	CFI	.97	.96
	IFI	.97	.96
	RFI	.93	.91
簡效適配指標	PNFI	.59	.64
	Normed chi-square	3.01	3.15

(二) 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各構面之信度

1. Cronbach's α 係數

目標取向之工作取向與自我取向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72 與 .83，而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89、.93 與 .83，所有構面皆超過 .70 以上，結果顯示目標取向各構面與教練—選手關係各構面皆具有內部良好的一致性。

2. 個別觀察變項信度

個別觀察變項信度之指標，可由驗證式因素分析所計算出之 R^2 值(變異比率)作為信度指數之依據，而個別觀察信度之標準值須大於 .20 以上(黃芳銘，2006；黃芳銘、楊金寶、許福生，2005)。本研究目標取向個別觀察變項信度介於 .29-.70 之間，教練—選手關係則是介於 .67-.81 之間。表示整體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仍具有良好的個別觀察變項信度。

3. 建構信度

建構信度 (CR) 之係數在 .90 以上為「優秀的」；.80~.90 為「非常好」；.70~.80 為「適中的」；.50~.70 為

「可接受的」；.50 以下為「不可接受的」(陳順宇，2007；黃芳銘，2006)。

目標取向之工作取向與自我取向構面建構效度為 .75 與 .83，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構面建構效度則為 .89、.93 與 .88，表示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的構面具有適中的建構信度，題項之間有相互關聯關係存在。

4. 萃取變異數

當萃取變異數大於 .50 時，則表示觀察變數所造成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大於一半以上，表示觀察變數貢獻之變異數大於測量誤差 50% 以上(陳順宇，2007；黃芳銘，2006)。目標取向之「工作取向」與「自我取向」構面萃取變異數各別為 .50 與 .55，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構面萃取變異數各別為 .72、.76 與 .71。可知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各構面的測量變數被潛在變數所解釋變異，有一半以上是來自於觀察變數。本研究目標取向和教練—選手關係的 Cronbach's α 係數、個別觀察變項信度、建構信度和平均萃取變異數如表 4 所示。

表 4 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信度分析表

變項	Cronbach's α 係數	個別觀察變項信度	建構信度	平均萃取變異數
目標取向		.29-.70		
工作取向	.72		.75	.50
自我取向	.83		.83	.55
教練-選手關係		.67-.81		
親密性	.89		.89	.72
承諾性	.93		.93	.76
互補性	.88		.88	.71

(三) 聚合效度

目標取向之工作取向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0 與 .55 之間，自我取向介於 .68 與 .83 之間；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83 與 .86 之間，承諾性介於 .84 與 .90 之間，互補性介於 .82 與 .86 之間，所有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高於 .50，因此本研究的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由結果可知，本研究目標取向量表與教練選手

關係量表具有良好模式適配度以及最佳的信效度。故將進一步利用結構模式探討目標取向以及教練選手關係之間的關係。

(四) 區別效度

本研究各潛在變項的平均萃取變異量開根號數值 (互補性=.90、工作取向=.81、承諾性=.91、自我取向=.82、親密性=.90)(表 5)，皆高於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本研究的潛在變項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 5 區別效度

	互補性	工作取向	承諾性	自我取向	親密性
互補性	.90				
工作取向	.48	.81			
承諾性	.79	.50	.91		
自我取向	.50	.72	.52	.82	
親密性	.79	.42	.72	.40	.90

三、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結構模式

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的模型經結構模式分析後顯示 (表 6)，結構模式的絕對適配指標、增值適配指標與簡效適配指標皆達到標準值，亦即結構模型與樣本資料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

模式經結構分析後顯示，目標取向之工作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 (S.E.= .91；C.R.=8.39***， $p < .001$)、承諾性 (S.E.=.89；C.R.=8.31***， $p < .001$)、互補性 (S.E.=.98；C.R.=8.50***， $p < .001$) 達

顯著水準。中等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

的「工作取向」對於教練—選手關係的「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亦即射箭學生運動員的工作取向愈高，有助於教練和選手之間的關係。然而，中等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目標取向之「自我取向」僅與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S.E.= -.14; C.R.= -2.50*， $p < .05$) 達顯著水準，且兩者具有負向的影響關係，也就是說，當射箭學生運動員的自我取向愈高，其與教練的親密性就愈低。

表 6 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結構模式適配度

適配指標	測量指標	適配值
絕對適配指標	GFI	.91
	RMSEA	.06
增值適配指標	NFI	.93
	TLI	.95
	CFI	.96
	IFI	.96
	RFI	.91
簡效適配指標	PNFI	.78
	Normed chi-square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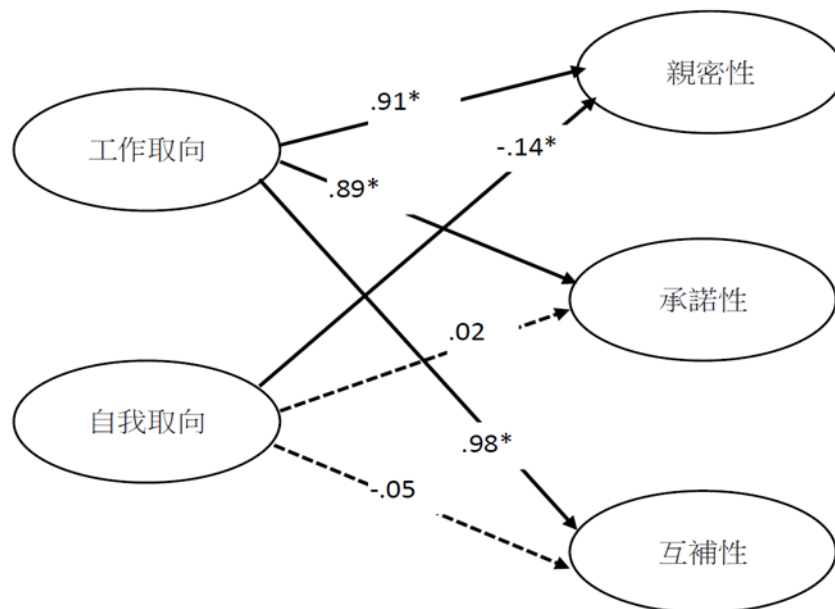


圖 1 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模式

肆、討論

一、討論

綜觀本研究分析結果，中等學校射箭學生運動員傾向工作取向時與教練—選手關係的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有較明顯的正向影響關係。本研究結果與 Elliot 與 Reis (2003) 的研究結果發現一致。Elliot 與 Reis (2003) 的研究結果發現目標取向與教練和選手關係呈現正向關係，學生運動員呈現工作取向，有助於與教練維持緊密互助關係，良好的人際關係，增強彼此間尊重和信任。換言之，射箭學生運動員的工作取向愈高，有助於教練與學生運動員間的關係。反之，射箭學生運動員傾向自我取向僅與教練—選手關係之親密性具有負向的影響關係，射箭學生運動員的自我取向愈高，與教練的親密性就愈低。

本研究結果支持目標取向與教練—選手關係之相互影響。Adie 與 Jowett (2010) 研究結果顯示，教練和選手的關係越佳，則彼此合作關係呈現承諾性和親密性，且學生運動員更可能掌握自我目標設定，同時學生運動員專注精熟趨向目標會與教練維持良好合作關係的。Jowett (2005) 的研究結果也發現學生運動員傾向工作取向，教練—選手關係偏向長期支持 (承諾性)、讚賞與尊重 (親密性) 以及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皆會達成共同目標 (互補性)。Olympiou 等 (2008) 依據典型相關分析研究結果

顯示，運動選手知覺工作取向與教練間具有高度的親密性，承諾性與互補性之相關聯性，彼此強調角色之重要性以及促進合作改進。國外相關研究發現教練與運動選手之間的關係與工作取向呈正相關。這些結果與先前的研究相符，教練—運動選手關係可能會影響運動員的動機 (Adie & Jowett, 2010; Riley & Smith, 2011)。

教練—選手關係對於學生運動員的動機觀點，教練取得成功關鍵因素之一為教練和選手關係的正向人際關係，此種關係能夠改變運動選手的表現和健康狀況 (Jowett, 2017)。學生運動員傾向自我取向與教練親密度、承諾和互補性之相關聯較低。過去一些研究結果支持教練—選手關係與自我取向學生運動員低相關性 (Isoard-Gauthier, Trouilloud, Gustafsson, & Guillet-Descas, 2016; Olympiou et al., 2008)。

Olympiou 等 (2008) 指出自我取向特性的學生運動員在教練—選手關係上有較低的親密度、承諾和互補性。換言之，學生運動員認為教練與他們之間的關係與教練在運動團隊中創造氣氛和自我看法相對應。本研究發現教練和選手之間的人際關係會影響運動選手對運動訓練和競賽賽的動機，此結果表明學生運動員對教練—選手關係的看法具有動機之影響性。

優秀的國手級選手在教練—選手關係的共同方向顯著高於未入選國家隊的選手，Jowett (2005) 認為教練與選手關係的結果在於是否能符合教練與選手的個人成長與發展的需求，例如：同理心、自信心與責任感的需求 (Jowett & Ntoumanis, 2004; Jowett & Meek, 2000)。Lorimer 與 Jowett (2009) 研究發現教練與學生運動員之間的互動，在運動運動技能訓練過程中，教練和運動員形成緊密的聯繫，並在訓練環境中發生高度的相互依存和互動。王清欉 (2014) 的研究指出較正向和具支持性的教練—選手關係對運動員心理的發展有所助益。因此，教練—選手關係互動的方式可以有效性和成功產生深遠的影響，進而影響滿意度和績效等結果。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與限制

學生運動員對教練關係的看法在強度和方向上有所波動，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透過質性研究來探討營造支持性的教練-選手關係之議題，如此才能更有效地預防或處理人際關係的議題，教練與學生運動員的看法可能會依據相互依賴的程度，進一步改善運動選手團隊凝聚力與成績表現。再者，利用不同運動種類和技術水準的學生運動員來驗證變項之差異，期以更加周延的教練—選手關係對於其他變項之影響，例如團隊凝聚力、運動表現、團隊滿意度、知覺教練領導行為等變項，有助提升國內運動教練與學生運動員之間的關係品質與結果。

在研究限制上，過往研究指出教練和選手關係為動態過程，本研究為橫斷式問卷調查，所獲得之不足之處為研究結果於偏重於量化的描述，缺少質化內涵敘述。因此，在研究方法與解釋上應會有推論上的限制，未來研究方向應在研究設計上深入探討教練—選手關係動態關係歷程。

引用文獻

- 王清欉 (2014)。運動熱情、教練—選手關係對大學棒球選手心理堅韌性之預測。《臺灣運動心理學報》，14(2)，33-49。
- 季力康 (1993)。運動目標取向量表—信度與效度分析。《國立體育學院論叢》，4(1)，179-185。
- 季力康、陳思羽、葉允棋、江衍宏 (2013)。中文版教練—選手關係量表之編製。《大專體育學刊》，15(4)，429-438。
- 陳淑滿、王俊明 (2005)。殘障運動員之社會化代理人、運動目標取向與運動員精神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6(2)，161-174。
- 陳順宇 (2007)。結構方程模式—Amos操作。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 陳金定 (2009)。移情現象之驗證：運動選手親子依附與教練—選手關係之因果模式探討。《教育心理學報》，40(3)，363-383。
- 黃芳銘 (2006)。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臺北市：五南。
- 黃芳銘、楊金寶、許福生 (2005)。在學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標發展之研究。《師大學報》，50(2)，97-119。
- 黃義翔、聶喬齡 (2012)。教練—選手關係在教練決策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關係中的中介效果探討。《臺灣運動心理學報》，12(1)，19-38。
- 鄭振洋、宋一夫、湯慧娟 (2013)。木球選手知覺教練—選手關係與運動價值觀對訓練滿意度之影響。《運動教練科學》，32，27-38。
- Adie, J. W., & Jowett, S. (2010). Meta-perceptions of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achievement goals,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among sport participant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0(11), 2750-2773.
- Elliot, A. J., & Reis, H. T. (2003). Attachment and exploration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317-331.
- Gervis, M., & Dunn, N. (2004). The emotional abuse of elite child athletes by their coaches. *Child Abuse Review: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and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3(3), 215-223.
- Hinde, R. A. (1997). *Relationship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 Hom, H. L., Duda, J. L., & Miller, A. (1993). Correlates of goal orientations among young athletes. *Pediatric Exercise Science*, 5(2), 168-176.
- Isoard-Gauthier, S., Trouilloud, D., Gustafsson, H., & Guillet-Descas, E. (2016).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and athlete burnout: An examination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hievement goals.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2, 210-217.

- Jowett, S. (2005). On enhancing and repairing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S. Jowett & M. Jones (eds.), *The psychology of coaching* (pp. 14-26).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Jowett, S. (2007).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ignite groupness. In M. Beauchamp & M. Eys (Eds.), *Group Dynamics Advances in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pp. 63-7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Jowett, S., & Cockerill, I. M. (2003). Olympic medal lists' perspective of the athlete-coach relationship.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4(4), 313-331.
- Jowett, S., & Meek, G. A. (2000).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married couples: An exploratory content analysis. *The sport psychologist*, 14(2), 157-175.
- Jowett, S., & Ntoumanis, N. (2004).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CART-Q):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14(4), 245-257.
- Jowett, S. & Lavalley, D. (2007). *Social psychology in sport*.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 Jowett, S., Shanmugam, V., & Caccoulis, S. (2012). Collective efficacy as a mediator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athlete satisfaction in team spor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10(1), 66-78.
- Jowett, S. (2017). Co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at its hear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6, 154-158.
- Junior, J. R. A., Fiorese, L., Vieira, J. L. L., Ferreira, L., Cheuczuk, F., Jowett, S., Fortes, L. S., & Vissoci, J. R. N. (2019).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in volleyball: Is the association explained by athletes' goal orientations? *Motricidade*, 15, 1-11.
- Lorimer, R., & Jowett, S. (2009). Empathic accuracy, meta-perspective, and satisfaction in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21(2), 201-212.
- Philippe, R. A., & Seiler, R. (2006). Closeness, co-orient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in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What male swimmers say about their male coaches.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7(2), 159-171.
- Olympiou, A., Jowett, S., & Duda, J. L. (2008). The psychological interface between the coach-created motivational climate and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team sports. *The sport psychologist*, 22(4), 423-438.
- Riley, A., & Smith, A. L. (2011). Perceived coach-athlete and peer relationships of young athletes and self-determined motivation for s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42(1), 115-133.

Williams, L. (1994). Goal orientations and athletes' preferences for competence information sources.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16(4), 416-430.

Wolters, C. A. (2004). Advancing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Using goal structures and goal orientations to predict students' motivation, cognition, and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6(2), 236-250.

作者簡介

第一作者：尚憶薇 (通訊作者)

服務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通訊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連絡電話：(03) 8903945

傳真： (03) 8900175

E-mail：iwshang@gms.ndhu.edu.tw

第二作者：古志銘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The Study of Goal Orientation and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Archery Student Athletes of The Secondary Schools

I-Wei Sh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Gordon Chih-Ming Ku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Abstract

Purpos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goal orientation theory,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 orientation and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the archery student athletes of secondary school.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surveys with convenience samples.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archery student athletes of secondary school, and 29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99.3%.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presented: the "task orientation" of archery student athlete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imacy", "commitment"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he ego-orientation of archery student-athletes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imacy" of the coach-player relationship. **Conclusion:** The task orientation of archery student athletes was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Coaches should encourage student athletes to become more proficient in their skills as a criterion for judging suc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also improv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es and athlet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ollow-up researchers select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of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 athletes in order to improve team cohesion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Keywords: task orientation, ego orient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ports performance